卷第一

论君道第一

贞观[①]初，太宗谓侍臣曰："为君之道，必须先存百姓。若损百姓以奉其身，犹割股以啖腹，腹饱而身毙。若安天下，必须先正其身，未有身正而影曲，上治而下乱者。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，皆由嗜欲以成其祸。若耽嗜滋味，玩悦声色，所欲既多，所损亦大，既妨政事，又扰生民。且复出一非理之言，万姓为之解体，怨谤[②]既作，离叛亦兴。朕每思此，不敢纵逸。"谏议大夫[③]魏征对曰："古者圣哲之主，皆亦近取诸身，故能远体诸物。昔楚聘詹何[④]，问其治国之要，詹

[译文]贞观(627～649)初年，唐太宗对众侍臣说："当一国国君的基本原则，必须先保存老百姓。若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，就如同割自己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自己的肚子。肚子填饱了，人也死了。如果想安定天下，必须先使自身端正。没有身子端正而身影弯曲、朝廷安定而百姓反而混乱的道理。我经常想，损伤自身的不在于外物，都是自身的贪嗜、奢欲所造成的祸患。如果过于纵情吃喝，沉湎声色，欲望越多，所受的损失就越大，既妨碍国政，又骚扰百姓。如果再讲出一些非理之言，就会导致民心离散，怨恨既已产生，众叛亲离之事，自然也会发生。我每想到这些，就不敢放纵自己去追求安逸享受。"谏议大夫魏征答道："古代的贤明之君，都能近从己身体验，所以能够远察别人。从前楚国聘用詹何，问其治国之要道。詹何以修身之术来对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何对以修身之术。楚王又问治国何如，詹何曰：‘未闻身治而国乱者。’陛下所明，实同古义。”

答。楚王又问治国之道，詹何回答说：‘没有听过国君自身清正，而其国反而不安定的。’陛下所阐明的道理，和古代圣贤之意实无二致。”

［注解］①贞观：唐太宗年号，公元 627～649 年。②怨谮：怨恨。谮（dú），谤也。③谏议大夫：唐代负责向皇帝规谏的官员。④詹何：楚国的一个隐士。楚庄王曾召见他问治国之道。

贞观二年，太宗问魏征曰：“何谓为明君暗君？”征曰：“君之所以明者，兼听也；其所以暗者，偏信也。《诗》云：‘先民有言，询于刍荛[①]。’昔唐、虞[②]之理，辟四门，明四目，达四聪。是以圣无不照，故共、鲧[③]之徒，不能塞也；靖言庸回，不能惑也。秦二世[④]则隐藏其身，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[⑤]，及天下溃叛，不得闻也。梁武帝[⑥]偏信朱异[⑦]，而侯景[⑧]举兵向阙，竟不得知也。隋炀帝[⑨]偏信虞世基[⑩]，而诸贼攻城剽邑，亦不得知

［译文］贞观二年（628），太宗问魏征：“什么样的国君是明君？什么样的国君是昏君？”魏征答道：“国君之所以能贤明，是因为他能广泛听取不同的意见；之所以会昏愚，是因为他偏听偏信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先民有言，询于刍荛。’（古代圣贤曾说过：有了疑难，可以去和割草、打柴的人商量。）以前尧、舜的治国方法，是广开四方之门，以纳天下之贤；广设四方视听，以采各方意见。遵循这样的治国之道，圣明的国君就没有不知道的事情，没有不清楚的问题了。所以，共工、鲧这类人不能蒙蔽他，佞言巧辩也不能迷惑他。秦二世则不是这样，他隐居深宫之中，不接近朝臣和百姓，只偏信赵高一人，直到天下崩溃，百姓叛离之时，他还一点消息都不知道。梁武帝偏信朱异，直到侯景举兵攻城，竟

也。是故人君兼听纳下,则贵臣不得壅蔽,而下情必得上通也。”太宗甚善其言。

然还不知道。隋炀帝偏信虞世基，各地义军攻城掠县，国势已危，他也不知道。所以，国君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，倾听下面的呼声，了解下情，那么权贵重臣便不能够掩盖君王耳目，而下情必能上达。”太宗很赞赏魏征这番话。

[注解]①刍荛：割草打柴的人。②唐、虞：指帝舜,传说中的古代圣王。③共、鲧：共指共工，鲧指夏禹之父。他们与三苗、驩兜，被称为“四凶”，都是古代传说中被认为是凶险的人物。④秦二世：秦始皇少子，名胡亥，公元前 230～前 207 年在位,后被赵高逼死。⑤赵高：秦朝的太监,始皇死,他伪造遗诏，逼死世子扶苏，立胡亥为帝。⑥梁武帝：名萧衍,南朝梁的开国之君。公元 502～549 年在位。⑦朱异：梁武帝的亲近大臣,蔽主弄权,曾任侍中。⑧侯景：原为东魏臣子，因朱异而降梁。后任梁朝大将军。后举兵反梁，攻陷台城，逼梁武帝饿死。⑨隋炀帝：即杨广，隋朝的第二个皇帝。公元 604～618 年在位，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。⑩虞世基：为隋朝大臣,他对各地起义的消息隐瞒不报，后为宇文化及所杀。

贞观十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帝王之业,草创与守成孰难？”尚书左仆射房玄龄①对曰：“天地草昧②，群雄竞起，攻破乃降，战胜乃克。由此言之，草创为难。”魏征对曰：“帝王

[译文] 贞观十年(636),太宗问侍臣们说：“帝王大业，草创与守成哪个较难？”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答说：“天下大乱之时，群雄竞起，必须打败他们才能使其归降，必须战胜他们才能攻克其地。由此看来，草创为难。”魏征对答说：“帝王之业的兴起，必须趁着世道衰败混乱的时机，推翻昏庸

之起,必承衰乱,覆彼昏狡，百姓乐推，四海归命，天授人与，乃不为难。然既得之后，志趣骄逸，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，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,国之衰弊,恒由此起。以斯而言，守成则难。”太宗曰：“玄龄昔从我定天下，备尝艰苦，出万死而遇一生，所以见草创之难也。魏征与我安天下，虑生骄逸之端,必践危亡之地,所以见守成之难也。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，守成之难者，当思与公等慎之。”

无道之君,百姓们乐于推戴拥护,四海之人都来归顺，上天授命，人民奉与，因此看来草创并不算难。然而得了天下之后,国君志趣日渐骄纵淫逸,老百姓想过安静的生活而徭役却无休无止,人民生活艰难但征税不断,国家的衰亡常常由此而起。以此而论，守成为难。’唐太宗说：“玄龄过去跟着我平定天下，历尽艰难困苦，九死一生，所以，他看到草创的艰难。魏征跟我安定天下，担心出现骄奢淫逸的事端，会导致国破家亡的境地,所以,他看到守成的艰难。现在草创之难已成往事,而守成之难,我当与诸位一起慎重对待。”

[注解]①尚书左仆射：尚书省长官，与中书省、门下省长官均为宰相之职。房玄龄（579～648）：字子乔，太宗时大臣。
②天地草昧：天地初开之意。草昧，如杂草一样杂乱，昏昧不清。

贞观十一年，特进魏征上疏曰：

“臣观自古受图膺运[①]，继体守文,控御英雄,南面临下,皆欲配厚德于天地，齐高明于日

[译文] 贞观十一年(637),魏征向唐太宗上书说：

“以臣所见,自古以来,凡是承天受命开创帝业或继承帝位的人，他们驾驭英雄，南面而治，都想德配天地，明齐日月，让子孙百世将帝位永远传

月，本支百世，传柞无穷。然而克终者鲜，败亡相继，其故何哉？所以求之，失其道也。殷鉴[2]不远,可得而言。

“昔在有隋[3],统一寰宇,甲兵强锐,三十余年，风行万里，威动殊俗,一旦举而弃之,尽为他人之有。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，不欲社稷之长久，故行桀虐[4],以就灭亡哉？恃其富强，不虞后患。驱天下以从欲,罄万物而自奉,采域中之子女，求远方之奇异。宫苑是饰，台榭是崇，徭役无时，干戈不戢。外示严重，内多险忌,谗邪者必受其福,忠正者莫保其生。上下相蒙，君臣道隔，民不堪命，率土分崩。遂以四海之尊，殒于匹夫之手，子孙殄绝,为天下笑,可不痛哉！

“圣哲[5]乘机,拯其危溺,八柱[6]倾而复正，四维[7]弛而更张。远肃下去。然而善始善终者少，倾败衰亡者多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循治国之道。前朝亡国的历史教训距今不远，可以作为鉴戒，用以说明。

“以前隋朝统一天下三十余年，兵强马壮，声威远播万里，震动异国，一旦覆亡，尽为他人所用。那隋炀帝难道不想让天下安定、社稷长久，故意要推行桀纣之暴政，以造成自己灭亡吗？他是仗恃其国家富强，而不考虑后患。他驱使天下百姓顺从自己的奢欲，搜刮天下财物供自己享受，拣选天下美女，掠夺远方的珍宝，宫苑装饰得豪华壮丽，楼台修建得高峻宏伟，徭役无穷无尽，用兵无休无止。外表威严庄重，内心猜忌险恶。谗佞邪恶之臣，必定会得到他的官禄和好处，而忠正之士却连性命也难保。佞臣上下互相欺蒙，君臣离心离德，老百姓不堪忍受，国家分崩离析。于是像隋炀帝这样堂堂一国之君，竟死于匹夫之手，其子孙也被斩尽杀绝，成为天下人的笑柄，能不令人痛心吗？

“圣哲(唐代皇帝)顺承机运,拯万民于水火之中，使支撑天的八根天柱倾而复正，使维系地的四条地维弛而更张。不超过一年的时间，便使远近人民安居乐业；胜残去杀，使天下太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迩安,不逾于期月 胜残去杀，无待于百年。今宫观台榭,尽居之矣 奇珍异物,尽收之矣 姬姜淑媛⑧,尽侍于侧矣 四海九州，尽为臣妾矣。若能鉴彼之所以失，念我之所以得，日慎一日，虽休勿休，焚鹿台⑨之宝衣,毁阿房⑩之广殿，惧危亡于峻宇，思安处于卑宫,则神化潜通,无为而治，德之上也。若成功不毁,即仍其旧,除其不急,损之又损,杂茅茨于桂栋，参玉砌以土阶，悦以使人，不竭其力,常念居之者逸,作之者劳,亿兆悦以子来,群生仰而遂性，德之次也。若惟圣罔念，不慎厥终，忘缔构之艰难，谓天命之可恃，忽采椽之恭俭，追雕墙之靡丽，因其基以广之，增其旧而饰之，触类而长,不知止足,人不见德,而劳役是闻,斯为下矣。譬之负薪救火，扬汤止沸，以暴易平。由此看来，废弃刑罚不用的境界，也无须百年，便可达到。现今宫殿观阁、楼台亭榭都已被我君拥有 奇珍异物都已被我君收藏；佳人美女都已侍我君之身旁；四海九州之士民都已为我君之臣属。如果能经常借鉴隋朝所以亡国的历史教训，常想我朝得天下的成功经验,一天比一天谨慎,虽有功德而不以功德自恃,烧掉鹿台、宝衣之类的奢侈品，毁弃阿房宫之类的宽广宫殿 每当居住在崇殿峻宇时,心里便会产生危亡之惧，而居住陋室低屋时，却感到心安理得。这样就能以自身的模范作用,给人以潜移默化的影响,从而达到无为而治，这是治国的上策。如果考虑到既成的东西不要毁坏，仍然保持旧貌,要免除那些不急之务,徭役要减之又减。即使是茅舍与华厦共存、玉砌和土阶并用也无妨。要使人敬业乐业，又要不竭民力。要常想到自己居而不劳的安逸和别人劳动的辛苦。这样,老百姓就会自愿来服役,他们依靠天子的恩德而安居乐业。这是治国的中策。如果是惟我独尊，不考虑后果,不善始慎终,忘记了缔造国家的艰难,认为有天命可以倚恃,从而忽视住陋室时的艰苦朴素作风，一味追求雕梁画栋的奢侈生活，宫殿在原有的基础上还要加以扩充，并广加修饰，

乱，与乱同道，莫可测也，后嗣何观！夫事无可观则人怨，人怨则神怒，神怒则灾害必生，灾害既生，则祸乱必作，祸乱既作，而能以身名全者鲜矣。顺天革命之后，将隆七百之祚，贻厥子孙，传之万叶，难得易失，可不念哉！”

惟美是求，事皆以此类推，不知止足，人民所见到的只是无止无休的劳役，见不到国君的恩德，这是最糟糕的治国方法。这样的做法就好比是背着柴薪去救火，向锅里添滚水来止沸，是用暴政来替代暴政，与先前的乱政同出一辙，并无二致。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，后世子孙将如何看待你的事迹？没有可观的政绩就会遭到天怒人怨，天怒人怨则灾害必生，灾害发生就会引起祸乱，祸乱一起，要保全身家性命和荣誉名声就很难了！这是治国的下策。顺应天命，鼎革天下之后，大唐将有七百年隆盛的国运，并将江山遗留给子孙，传之万代。江山难得而易失，能不认真考虑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吗？”

[注解]①受图膺运 得到河图，接受天命。河图，传说伏羲之时，有龙马从黄河出，背负“河图”；有神龟从洛水出，背负“洛书”。河出图、洛出书，均是圣人出的征兆。 ②殷鉴：《诗经·大雅·荡》“：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。”谓殷人应以夏朝灭亡的教训为借鉴。鉴，镜子。 ③有隋：即隋朝。有，发语词。 ④桀虐：夏桀的暴行。夏桀是夏朝末代的一个帝王，因行暴政，为商汤所灭。 ⑤圣哲：指圣贤。即才智超群的人。 ⑥八柱 古人认为天地之间有八根柱子在撑着天，使之不坠。 ⑦四维 古人认为，地是方的，有四条绳子维系着。又古人将礼、义、廉、耻维系封建道德的四条准则，称为四维。 ⑧姬姜淑媛 指宫中的美女。姬、姜均指贵族。 ⑨鹿台 为殷纣王所筑，在今河南汤阴朝歌镇南。纣王为周武王所败，登鹿台自焚而死。 ⑩阿房（páng）：秦始皇所建之宫殿，在今西安市西阿房村。项羽攻破咸阳，火烧了阿房宫。

是月，征又上疏曰：

“臣闻求木之长者，必固其根本；欲流之远者，必浚其泉源；思国之安者，必积其德义。源不深而望流之远，根不固而求木之长，德不厚而思国之理，臣虽下愚，知其不可，而况于明哲乎！人君当神器[1]之重，居域中之大，将崇极天之峻，永保无疆之休。不念居安思危，戒奢以俭，德不处其厚，情不胜其欲，斯亦伐根以求木茂，塞源而欲流长者也。

“凡百元首[2]，承天景命[3]，莫不殷忧而道著，功成而德衰。有善始者实繁，能克终者盖寡，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？昔取之而有余，今守之而不足，何也？夫在殷忧，必竭诚以待下；既得志，则纵情以傲物。竭诚则胡越为一体，傲物则骨肉为行路。虽董[4]之以严刑，震之以

这个月，魏征又上书说：

“臣听说，要想让树木高大茂盛，必须使树木根深本固；要想让河水流得长远，必须疏浚通畅它的源泉；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，就必须多积道德仁义。河流的源泉不深而希望河水流得长远，树木的根基不牢而希望树身长得高大，德义积得不深厚而希望国家长治久安，愚昧如臣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更何况那些明哲之士呢？国君掌国家大权，居天下极位，有至高无上的尊严，应永保无尽之福禄。若不能够居安思危，不能力戒奢侈而提倡节俭，不能够广积美德，不能够战胜情欲，这就像伐断树根而希望树木茂盛，堵塞源头而希望河水长流一样。

“大凡做国君的，在应天承命开创基业之时，没有一个不是因常常谨慎而德业显著的。但他们一旦大功告成之后，其德业就开始减衰。能善始的人很多，能善终的人就很少了。难道这是夺取政权容易而守住政权困难吗？过去夺取天下力量有余，而今天守住天下却力量不足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是因为，在创业时心里常常想着忧患，困难重重，就必然竭心诚意地对待下属；一旦得志，就会心高气扬，放纵情欲，看不起他人。当以诚待人

威怒，终苟免而不怀仁，貌恭而不心服。怨不在大，可畏惟人，载舟覆舟，所宜深慎，奔车朽索,其可忽乎！

“君人者，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，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，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，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，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，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，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，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，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，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。总此十思，弘兹九德,简能而任之,择善而从之,则智者尽其谋,勇者竭其力，仁者播其惠，信者效其忠。文武争驰,君臣无事,可以尽豫游之乐,可以养松、乔[5]之寿,鸣琴垂拱,不言而化。何必劳神苦思，代下司职，役聪明之耳目，亏无为之大道哉！”

之时,即使是极其疏远的北胡、南越之人，也能够亲如一体；当傲视他人时，即使是亲如骨肉也会变得如同陌路人。就是用严刑峻法来督察，以威然发怒来恐吓，也不会有多大效果。顶多是人们尽量避免不触犯刑罚，而内心仍存异意，表面恭顺而心里不服。怨气不在于大小，可怕的是人心的背离 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,所以应该加倍小心。用朽绳烂索去驾驭飞奔的车马，这种危险岂可疏忽大意！

“作为国君的，在见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时，就该想到以知足自我警惕 将要大兴土木,役使百姓时,就应想到适可而止以安定人心；念及地位高危时，就应想到谦虚和约束自己；害怕骄傲自满听不进谏言时，就应想到要有像江海容纳百川一样的度量；沉溺于游乐打猎时，就应想到古代的帝王一年只许出猎三次的限度；担心工作懈怠不能坚持到底时，就应想到做任何一件事都要善始善终；考虑到不为人闭塞耳目，就想到要虚心听取下层人民的意见；担忧谗邪小人干政，就应想到要端正自身,斥退邪恶 要实行赏赐时，应想到不能因一时高兴就乱加封赏 要进行惩罚时,应想到不能因为自己一时心情恼怒就滥施刑罚。总之,做到以上‘十思’,弘扬这些美

德，选拔有才能的人做官，接受好的意见去办，那么有才智的人就会尽献其智，有勇力的人就会竭尽其力，有仁德的人就会广播其恩惠，有信用的人就会效其忠信。文臣武将争相为国出力，君臣之间相安无事，这样君王就可以尽享宴游之乐，可以像神仙赤松、王乔一样延年益寿,可以像虞、舜一样鸣五弦之琴,歌南风之诗,无为而治，不言而民风自化。何必去亲自劳神操心，苦思冥想，代部下去做具体事务，役使自己的耳目，浪费才智聪明，损伤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呢！”

[注解] ①神器 指权位。 ②凡百元首：诸多国君。元首，头脑，此指国君。 ③承天景命 承受天命。景,大。 ④董：督。 ⑤松、乔 赤松、王乔,都是传说中的仙人。

太宗手诏答曰：

“省频抗表，诚极忠款，言穷切至。披览忘倦，每达宵分。非公体国情深,启沃义重,岂能示以良图，匡其不及！朕闻晋武帝[①]自平吴已后,务在骄奢,不复留心治政。何曾[②]退朝谓其子劭[③]曰：‘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，但说平生常语，此非贻厥子孙者,尔身犹可以免。’指诸孙曰：‘此等必遇乱死。’及孙绥[④],果为淫刑所戮。前史美之，以

唐太宗亲写诏书回答魏征道：

“看了你几次上书，写得非常诚恳，体现出你一片忠心。你言无不尽，情切意深,使我读起来忘了疲倦,往往直到深夜，都不忍释卷。若不是你对国家社稷感情深厚，情深义重地开导我,怎会写出这么好的治国良策,匡正我的过失呢？我听说晋武帝平定吴国之后,就开始追求奢侈享乐的生活,不再留心于治理朝政。何曾退朝后对其子何劭说：‘我每次见到主上,他都不谈治理国家的宏图大略，只说些平常琐事。这不是能将江山永传子孙的圣主,你也许还可以幸免杀身之祸。’他指着自己几个孙子说道：‘然而他们必定会遭乱而死。’到了其孙何绥,果

为明于先见。朕意不然,谓曾之不忠,其罪大矣。夫为人臣，当进思尽忠,退思补过,将顺其美,匡救其恶,所以共为治也。曾位极台司，名器崇重,当直辞正谏,论道佐时。今乃退有后言，进无廷诤，以为明智，不亦谬乎！危而不持，焉用彼相？公之所陈，朕闻过矣。当置之几案,事等韦、弦[5]。必望收彼桑榆[6]，期之岁暮,不使康哉良哉,独美于往日,若鱼若水,遂爽于当今。迟复嘉谋，犯而无隐。朕将虚襟静志,敬伫德音。”

然死于酷刑。以前史书上都赞美何曾，以为他有先见之明。而我的看法却不同,我认为何曾不忠,他的罪是很大的。作为人臣，应该上朝时想着为国尽忠,退朝后则想着为君补过 国君行美政时，要竭力助成；国君有过失时,要匡正补救 这样才能共同把国家治理好。何曾位极人臣,名重一时,应当直言明谏,以治国之正道,来匡正国君，辅佐时政。而他却在回家后背地里发表私议，朝堂之上却不直言诤谏，若以此为明智，不是荒谬绝顶吗？国家就要倾覆了,还不站出来扶助,要他这个宰相有何用？你所呈献的至诚之言，使我明白了自己的过失。我当置之案几之上，就像西门豹佩韦以自缓，董安于佩弦以自急一样，时刻提醒自己。我必定能在晚年把国家治理好，使‘康哉、良哉’的盛世颂歌,不只出现在虞舜时代。如今，我们君臣之间，就如同鱼水一样亲融无间。对于你的佳谋良策，迟至今日才作答复，希望你仍能犯颜直谏，无所顾忌。我将虚怀静心，恭候你的德音。”

[注解] ①晋武帝：即司马炎（236～290），河内温县（今属河南）人。司马昭之子，继父为魏相国、晋王，后代魏称帝，建立西晋。 ②何曾：曾参与司马炎的篡魏活动，后官至西晋丞相。 ③劭 即何劭,何曾之子。 ④绥 即何绥,何曾之孙,为西晋尚书，后为东海王司马越所杀。 ⑤韦、弦 :韦，柔皮。弦，弓弦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《韩非子·观行》:“西门豹之性急,故佩韦以自缓;董安于之性缓,故佩弦以自急。”　⑥桑榆:本指落日之余光所照处,喻暮年。《后汉书·冯异传》:“始虽垂翅回溪,终能奋翼涸池。可谓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。”

贞观十五年,太宗谓侍臣曰:“守天下难易?”侍中魏征对曰:“甚难。”太宗曰:“任贤能,受谏诤,即可。何谓为难?”征曰:“观自古帝王,在于忧危之间,则任贤受谏。及至安乐,必怀宽怠①,言事者惟令兢惧②,日陵月替,以至危亡。圣人所以居安思危,正为此也。安而能惧,岂不为难?”

[译文] 贞观十五年(641),太宗对侍臣说:“守天下是难还是易?”侍中魏征对答说:“非常难。”太宗说:“只要能选贤任能,采纳谏言就可以了,怎么还说很难?”魏征说:“综观自古以来的历代帝王,处在忧患危险的境地时,则能够选贤任能,接受意见;到了局势安定,开始安逸享乐的时候,就必然散漫懈怠。对参与朝政的大臣,只喜欢他们战战兢兢,惟命是从,这样下去,就会国势日衰,走向危亡。圣人所以能够居安思危,正是这个缘故。安逸时,能常怀警惧之心,难道说这是容易的吗?”

[注解] ①宽怠:松弛怠慢。　②兢惧:谨慎小心。

论政体第二

贞观初,太宗谓萧瑀①曰:“朕少好弓矢,自谓能尽其妙。近得良

[译文] 贞观初年,太宗对萧瑀说:“我年轻时喜好弓箭,自认为能尽知弓箭的奥妙。最近我得到了十多张

弓十数，以示弓工。乃曰：‘皆非良材也。’朕问其故，工曰：‘木心不正，则脉理皆邪，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，非良弓也。’朕始悟焉。朕以弧矢定四方，用弓多矣，而犹不得其理。况朕有天下之日浅，得为理之意，固未及于弓，弓犹失之，而况于理乎？”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，更宿中书内省，每召见，皆赐坐与语，询访外事，务知百姓利害、政教得失焉。

良弓，拿它们给造弓的工匠看。工匠说：‘都不是良材所制。’我问其中缘故，工匠说：‘制弓的木料中心不正，所以木料的纹理都是斜的。弓虽刚劲有力，但射出的箭却不直。所以不是良弓。’我这才明白其中的道理。我以弓箭平定四方，用的弓箭可谓多矣；如今我初得天下，对于治国之道远不如对弓熟悉。对弓的奥妙我尚不明白，更何况治国之道！”自此以后，太宗下诏，让五品以上的京官，轮番住在中书省值班，每次召见，都赐予座位，和他们谈话，一一询问各地方的情况，务必知道百姓的利益和疾苦，以及政治教化的得失。

［注解］①萧瑀：太宗时大臣。南朝梁明帝之子，贞观初官太子少师，迁仆射，又迁御史大夫，后官至金紫光禄大夫。

贞观元年，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[①]曰：“中书所出诏敕，颇有意见不同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。元置中书、门下，本拟相防过误。人之意见，每或不同，有所是非，本为公事。或有护己之短，忌闻其失，有是有非，衔以为怨。或有

［译文］贞观元年(627)，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：“中书省所发出的诏书和文件，门下省与其意见颇不相同。有时两者都互有疏失，但可相互纠正。原先设置中书省、门下省的时候，就是为了相互监督，以防止过失和错误发生。人们的意见，常不相同，有的正确，有的错误，本意都是为了公事。但也有人护己之短，怕别人指出他的过失，听到别人议论他的是非，便

苟避私隙,相惜颜面,知非政事，遂即施行。难违一官之小情，顿为万人之大弊。此实亡国之政，卿辈特须在意防也。隋日内外庶官，政以依违,而致祸乱,人多不能深思此理。当时皆谓祸不及身,面从背言,不以为患。后至大乱一起，家国俱丧，虽有脱身之人,纵不遭刑戮,皆辛苦仅免，甚为时论所贬黜。卿等特须灭私徇公，坚守直道,庶事相启沃,勿上下雷同也。”

含恨在心。有的人则苟且行事，竭力避免私人恩怨,相互照顾脸面,明知诏令不当，也不提批评意见就执行。由于不愿违背一个官员的私人情面，却在顷刻间造成危害万人的大弊端。这实是亡国的做法，你们要特别注意防范。隋朝时，朝廷内外的官员都人云亦云,不敢提出不同意见,从而导致祸乱，人们大多不去深思此中道理。当时大家都认为祸事不会轮到自己头上，阳奉阴违，不知道这样做是有害的。到后来大乱一起,家破国亡,虽说有人能及时逃身,幸免杀身之祸,但也是活得甚为辛苦艰难，且深受时论谴责。你们必须去私奉公,坚守正道,凡事都要相互切磋议论,互相启发,千万不可一唱百随,上下雷同啊!”

[注解]①黄门侍郎：官名，掌管皇家机要文件，备皇帝顾问。王珪：唐初大臣，太宗初即位时为谏议大夫，贞观元年迁黄门侍郎。

贞观二年，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：“近代君臣治国，多劣于前古,何也?”对曰:“古之帝王为政，皆志尚清静，以百姓之心为心。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，所任用大臣，复非经术

[译文] 贞观二年(628)，太宗问王珪:“近代君臣治国,多不如上古君臣,这是什么原因?”王珪回答说:“古代帝王治理国家，都崇尚清静无为之治,都是想百姓之所想。近代帝王则不然，他们只知道损害百姓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，所任用的大臣又都不是精通经学儒术之士。汉朝的宰相，无

之士。汉家宰相，无不精通一经，朝廷若有疑事,皆引经决定,由是人识礼教，治致太平。近代重武轻儒，或参以法律，儒行既亏，淳风大坏。”太宗深然其言。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,兼识政体者,多进其阶品,累加迁擢焉。

不精通一门经典，朝廷中若有疑难之事，都是引用经书来加以解决。因此，人们多识礼乐教化，国家治理臻于太平。近代重视武功而轻视儒教，有时又搀杂法治。儒家的礼乐教化既然不受重视，淳朴的社会风气随之受到严重的破坏。”太宗很赞同王珪的意见。从此之后，百官中凡是学识渊博又懂治国之道的人，大多数都被晋级提拔，加以升迁重用。

贞观三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中书、门下①，机要之司,擢才而居,委任实重。诏敕如有不稳便，皆须执论。比来惟觉阿旨顺情，唯唯苟过，遂无一言谏诤者，岂是道理？若惟署诏敕、行文书而已，人谁不堪？何烦简择，以相委付？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，必须执言，无得妄有畏惧,知而寝默。”

[译文] 贞观三年(629),太宗对侍臣说：“中书、门下两省,都是国家的机要部门。选择有才能的人来担任此职,其委任实为重要。诏诰命令,如果有不妥当之处,都必须坚持己见,认真议论。近来发觉你们阿谀朕旨，顺从上情，唯唯诺诺地让诏令草率通过，竟无一人提出不同意见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如果仅是签署诏令、颁行文书,这些事谁不会干？何必还劳神选才，委以重任呢？自今日起，凡对诏书敕命认为有不妥当的，都必须坚持自己的看法,不要妄自菲薄、有畏惧之心,明知不对而沉默不言！”

[注解] ①中书、门下：唐设尚书、中书、门下三省。皆是直属皇帝领导的最高部门。

贞观四年，太宗问萧瑀曰："隋文帝[1]何如主也？"对曰："克己复礼，勤劳思政，每一坐朝，或至日昃，五品已上，引坐论事，宿卫之士，传飧而食，虽性非仁明，亦是励精之主。"太宗曰："公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。夫心暗则照有不通，至察则多疑于物。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[2]，恒恐群臣内怀不服，不肯信任百司，每事皆自决断，虽则劳神苦形，未能尽合于理。朝臣既知其意，亦不敢直言。宰相以下，惟即承顺而已。朕意则不然，以天下之广，四海之众，千端万绪，须合变通，皆委百司商量，宰相筹画，于事稳便，方可奏行。岂得以一日万机，独断一人之虑也。且日断十事，五条不中，中者信善，其如不中者何？以

［译文］贞观四年（630），太宗问萧瑀道："隋文帝是怎样的一位君主？"萧瑀答道："隋文帝能够克制自己，符合礼仪，勤勤恳恳地治理朝政，每次坐朝，甚至到太阳西斜时还不下朝。五品以上的官员，他都赐坐与他们一起谈论国事。由于坐朝时间很长，担任宿卫的武士，只好在岗位上站着吃饭。虽然他的品性算不上仁慈明智，却也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君主了。"太宗说道："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隋文帝这个人，性格过于苛细而不明事理。不明事理，就难免有疏漏；心眼过细，就容易过虑多疑。他因欺孤儿寡母以得天下，所以担忧群臣内心不服，不敢放心依靠文武百官。每遇事总是一个人决断，亲自处理，虽然劳累得精疲力竭，形容憔悴，也没能把事情都办得合情合理。朝臣们既知个中原因，自然不敢直言。宰相以下的官员，只好顺承其旨，不敢稍有异议。我的看法与他截然相反。以天下之广，海内之众，事情千头万绪，必须变通处理，不能千篇一律。应该全部交给各部门的官员商议，宰相再统一筹划，直到稳妥后，方可呈奏施行。一日万机的繁忙事务，怎能都让君主一人专虑独断呢？假若一日裁断十事，而有五

日继月,乃至累年,乖谬既多，不亡何待？岂如广任贤良,高居深视,法令严肃,谁敢为非 ?'因令诸司，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,必须执奏,不得顺旨便即施行，务尽臣下之意。

件事处理不当，裁断正确的当然很好，但是裁断错了的事该怎么办呢？如此日积月累，以至数年，错误越积越多，国家焉能不亡！不如广泛选任贤良之士,分层负责,而国君高居上位,远虑深谋，法令严肃，谁还敢胡作非为呢 ?'于是诏令各个官署,若朝廷诏令颁布下来,发现有不妥当的,必须据理上奏,不得阿顺旨意施行,一定要尽到做臣子的责任。

[注解]①隋文帝：即杨坚(541 ~604)。北周时袭父爵为隋国公，后任朝丞相，总揽朝政。公元 581 年废周自立，建立隋朝。

②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：杨坚的女儿为北周宣帝皇后，宣帝死后，他废黜年幼的周静帝，自立为帝。

贞观五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治国与养病无异也。病人觉愈，弥须将护,若有触犯,必至殒命。治国亦然，天下稍安,尤须兢慎,若便骄逸，必至丧败。今天下安危，系之于朕。故日慎一日，虽休勿休。然耳目股肱①,寄于卿辈，既义均一体，宜协力同心,事有不安,可极言无隐。傥君臣相疑，不能

[译文] 贞观五年(631),太宗对侍臣说：“治国与养病道理相同。病人觉得病情有好转时，要更加小心护理。若再触发犯病，一定会有生命危险。治国也是这样。天下刚刚安定，尤须小心谨慎。如果因此骄奢淫逸，必然招致丧败。现在天下的安危，全维系在我身上。所以我日慎一日，虽然有休息享乐的条件，也不敢这么做。我的耳目股肱都寄托在你们身上。既然君臣之义把我们联成一体，就应当协力同心。事有不妥当之处，要直言无忌,不可隐瞒。若君臣相疑,不能肝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